

新观察

儿童文学写作需加强“智慧”和“情感”含量

说来惭愧,虽然是为孩子们写作的人,也经历过无数的“六一”节,我却从来没有去追溯过它的缘起。每年到了这一天,不管平时多么忽略它存在的大人,都会意识到这是孩子的节日。“六一”节变成了笑声的海洋,商家们摩拳擦掌想狠狠赚一笔,学校则组织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每年的“六一”节都是和孩子们扑了粉的红脸蛋、琳琅满目的玩具、衣服以及眼花缭缭的美食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符号共同构成了“六一”节几十年不变的表情:快乐、阳光、爱、和平……若不是一位朋友的提醒,我也不会在这个充满欢歌笑语的时刻去探究它沉重的起源。“六一”儿童节原本是纪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捷克村子里被德国法西斯枪杀的少年儿童以及所有在这场大战中死难的孩子设立的。为了保障儿童的权利,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决定每年6月1日为国际儿童节。这样庄重而真诚的初衷,会让人的内心瞬间肃穆起来,然而我也不想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去想什么毒奶粉、皮革果冻、流向学校餐桌的地沟油和5800万的留守儿童——披着温情脉脉的外衣说些例行公事和功利廉价的祝福是容易的,空泛而漫无目的的指责同样于事无补,不如各家返回自身,想想挂在嘴头的对孩子的爱有多少已经流于形式和姿态,有多少少已经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就拿图书来说吧,这些送给孩子的精神礼物,有多少浅薄随意的文字为了赶着这个日子上市而仓促面世。前些天我参加一个儿童读物的评审活动,和我一组的是位从未参加过此类活动的评委,我以过来人的自矜自得的口吻告诉他,儿童文学创造了市场神话,它的发行量已经达到多少。然而,他翻看了参评的图书后,却愤愤地跟我说:“有些书写得那么通俗、随便,我羞于说这些书是我选出来的。”他说话的语气仿佛在谈论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工程。批评只有在与己无关的旁观者的内心才是痛快淋漓的,当它一旦指向自身,被评判的人便不由自主地竖起刺猬般的防卫反击的刺。他的话让我的内心耿耿了好多天,认为他以偏概全无知无畏,我可以举出无数的事例证明很多写作者是以其沉静而柔韧的心灵,朝向经典写作的方向飞翔的。然而你终究不能认定他全然是敌意和挑剔,他的批评里也有着旁观者的清醒。是的,在市

场的指挥棒下,大家都朝着畅销的路子走,放眼一望,满坑满谷的书,打开一看,大同小异。我们被商业化的鞭子赶着一路向前,已经没有时间把作品当成一个艺术品去精雕细琢。“半部经典”的现象就特别明显,往往你看一本书,开头很精彩,让人为作家的才情天赋拍案叫绝,再看下去就不知所云。开头就像人戴的帽子,反正有一顶华丽的帽子能吸引住读者的眼球,买了这本书就算成功,至于要写什么、为什么写和怎么写,对不起,实在没时间考虑这些问题。我记得老作家葛翠琳说过:“文学创作,写什么?怎么写?作品在读者心中留下什么?这是我不断实践反复思考的问题。每写一个作品,都像面对一份考卷,我希望自己写得更好些。”这样的理念,本应成为每个写作者坚守的底线,在今天却已经变成了一种奢望。

这样敷衍的写作态度,也多半源于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认为孩子毕竟在人生经验和知识的积累上是匮乏的,是好糊弄好忽悠的。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前些日子我去了一些小学给孩子们讲课,常常是不到一个小时,后背已是大汗淋漓。我记得在一个二年级的课堂上,一位小男生从容地站起来提问,让我讲讲自己在写作时都运用了哪些艺术手法。而当我“刁难”他们,突然问到北京有多少人口时,愣是没难住这些二年级的孩子。他们的活跃、伶俐已经完全超出了我的经验。我曾经就这个问题和一个同行在电话里交流了很久,我提醒他不要小瞧了孩子,如果有机会,应该到学校里去和他们生活一段时间。当时他还以为意地说,孩子们就是害怕别人说他们幼稚,才会准备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显示自己的成熟。然而,就在前两天,我和这位同行又在浙江上虞相遇,我们晚上一同观看了上虞市小学生的文艺汇演。孩子们在节目中对于艺术本身的陶醉和领悟,震撼在场的每一个人,我的这位同行也不由得点头赞叹。当然,这并非事情的全部,在一次和孩子们的交流中,我遇到一个6岁半的小女孩,已经阅读了包括《时代广场的蟋蟀》《长袜子皮皮》在内的很多儿童文学经典之作,而另一个在她位的五年级的孩子,却只读了一些有限的通俗读物而已。中国太大了,城乡的差距,地区间的不平衡,甚至家庭教育的不同,都造成了孩子间在文化生活上的巨大差异。对于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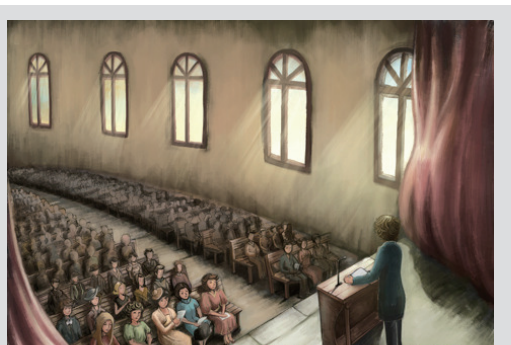
个写作者而言,不能因为浅易无难度的写作拥有市场,就忽略了还有一个庞大的高端的读者群。我们对于孩子的爱,不是俯视,不是仰视,不是说教,不是讨好,而是尊重,这种尊重是对孩子的智慧和情感的尊重,是深入其中,对他们在了解的基础上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尊重,在尊重的基础上保持危机意识,只有甘当小学生,才能写好小学生,在当下,这已不是一种故作谦逊的姿态。毕竟,在刚刚唤醒的巨大的阅读热情面前,孩子和孩子的家长们还有一种饥不择食的粗率和无从选择的茫然,一旦他们的阅读进入理性阶段,他们的眼光必然变得苛刻和挑剔,到那个时候,这种清浅的没有智慧含量的写作必将遭到冷遇和抛弃。

除了“智慧”含量的匮乏,当下的儿童文学写作还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情感”含量不足。我想孩子和家长们最清楚,冰心的《寄小读者》和林海音的《城南旧事》一直居于少儿的畅销书榜上,历经岁月的淘洗而经久不衰。我曾经和一些朋友探讨其中的原因,有人说因为这两部书中的作品都入选了教材,有人说孩子的买书书主要取决于父母,而父母对于这些经典作品的记忆让他们乐于买来传给下一代阅读。这当然都是很重要的原因。然而,当我作为一个成年人再次捧读这两部作品时,依然被深深地打动。为什么呢?我不断地问自己,文字都很浅易,故事也不曲折,和那些花样百出的文字技巧相比都谈不上有什么技巧,然而它们依旧具有催人泪下的力量,这种力量源自何处?我想这是因为她们在书中所倡导的“爱”和“善”,不是一种姿态,而是源于作者内心的真诚。我们来看冰心对于儿时没有救助一只小老鼠时的真切的忏悔,我们来看林海音对于那些底层大众深深的同情,字里行间无一不浸透着一种博大的悲悯的情怀。现在的写作者也许就是因为太聪明了,知道儿童文学就是写“真善美”的,那么,好的,我就编一个真善美的故事吧。这样的故事可以复制很多很多,然而它们却像假花一样,虽然艳丽,却没有真实的情感蕴含其中,缺乏打动人的力量。所以我们有成千上万的图书来到这个世界上,却抵不过两本薄薄的几万字的小书。我们编织了无比花哨的语言,却抵不过那些单纯的、朴素的文字对于心灵的冲击。文学的力量不是来自于文字的累积和



“六一”国际儿童节

1942年6月,德国法西斯枪杀了捷克利迪策村16岁以上的男性公民140余人和全部婴儿,并把妇女和90名儿童押往集中营。村里的房舍、建筑物均被烧毁。为了悼念利迪策村和全世界所有在法西斯侵略战争中死难的儿童,1949年11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举行理事会议。为了保障世界各国儿童的生存权、保健权和受教育权,为了改善儿童的生活,会议决定以利迪策村屠杀发生时的6月的第一天为国际儿童节。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23日规定,将中国的儿童节与国际儿童节统一起来。



为了悼念利迪策村和全世界所有在法西斯侵略战争中死难的儿童,1949年11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举行理事会议。

会议决定以每年的6月1号为国际儿童节,保障世界各国儿童的生存权、保健权和受教育权,改善儿童的生活。

关注

儿童文学评奖如何更有影响力

□李晓晨

细数国内的儿童文学奖项,影响较大的有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等,此外由中国新闻出版总署设立的“五个工程奖”、“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等每年也奖励、推荐相当数目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如若再算上各地区、各杂志报刊社等设立的奖项,那真得花些时间才能数个明白。在儿童文学越来越受到关注、重视的今天,面对参差不齐的儿童文学作品,儿童文学评奖如何才能更有影响力,从而对创作、阅读、出版发挥引导与示范作用?

5月29日,又一个新的儿童文学评奖开花结果,首届“儿童文学金近奖”在浙江上虞揭晓,评奖坚持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相统一的标准,共评出作品奖、插画奖、优秀小作家奖和优秀写作中心奖四类奖项,获奖者中既有王巨成、老臣、毛云尔、汤汤等业已小有名气的作家,也有许多尚不为读者所熟悉的新生力量。这一以知名儿童文学作家金近先生命名的奖项,旨在挖掘优秀创作人才,鼓励作家为孩子们创作更多精品力作,从而繁荣儿童文学创作。翻看评委会名单、评审细则及获奖作品,主办方为实现上述目标的努力可见一斑,然而要确保一项评奖的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却也绝非易事。

评奖不能“一”奖便罢

时下,名目繁多的儿童文学奖项常会让人们提不起兴致,那些曾经颇有些声势的评奖活动有许多都在“首届”之后就了无声息,当时远大的目标、严格的细则、殷切的期待都随着时间流逝化为乌有。设奖者的心血打了水漂,获奖者也很难因此而备受鼓舞,更不用说引导创作、发现人才了。奖都不存在了,谁还在乎别的?对照那些有较强影响力的国内外儿童文学奖项,大多都是在长期运作中不断磨合、调整、完善、发展,在与其他评奖的较中形成明确的自我定位,从而拥有了不能被替代的重要地位。

2010年,上虞市政府有关部门与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旗下的《儿童文学》杂志社接洽,提出凭借金近故乡的地域优势设立一个儿童文学奖项,以弘扬金近先生的精神、推动儿童文学事业的发展。对此,杂志社主编徐德霞起初怀疑态度,她最担心的是这样一一个奖项到底能评几届,地方政府会不会一时兴起,将来万一换了领导评奖很可能无疾而终。如此一来不仅会砸了杂志社的招牌,还会连带损害了金近的名声。所以她保守地提出,不如双方合作举办一届儿童文学作品征文活动,能办下去固然好,办不下去也不至产生多坏的影响。最终结果是,当地政府与杂志社签下十年之约,今后该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参评作品为前两个年度在《儿童文学》上、下两刊发表的优秀原创儿童文学作品,“这样至少能保证评奖活动的延续性,有了足够的时间保证我们能够不断摸索更科学、客观、公平的评奖方式,真正发现符合孩子阅读需求的优秀作品”。

定位明确才能增强影响力

在目前的各级各类儿童文学奖项里,“儿童文学金近奖”与一些国家级评奖相比算不上多高的级别,1万元的奖金与许多商业性奖项相比也谈不上丰厚,这样一个评奖要想切实增强自身影响力,最根本还是要回到本体、明确自我定位。中少总社副社长吴翠兰认为,该奖项与其他儿童文学奖项的最大区别就是要通过这一平台力推尚未成名但有潜力的中青年作家,尽力搭建作家梯队,设立优秀小作家奖、优秀写作中心奖就是为了发现更多文学新苗,为儿童文学创作输送新鲜血液。

从创作导向上而言,金近作品深入生活、热爱孩子的精神值得推崇,现在许多儿童文学作家有学识、有才情,他们更重视从文化而非生活中汲取营养。中国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副秘书长李启民就提出,“这一奖项的最大意义就是引导儿童文学作家深入生活、深入孩子、关注现实,真正把孩子的情感、生活融入创作。”王巨成的获奖作品《耳光响亮》就是作者在熟悉的校园生活中获得的灵感,一个孩子被同学打了一耳光,回家后家长非要孩子找同学报仇,孩子最终狠狠回扇了同伴一巴掌,友谊也彻底破裂。作家要了解少年儿童儿童的特点,这样才能为他们提供更多宝贵的精神食粮,发挥儿童文学在培养人、熏陶人、教育人方面的独特作用。

儿童文学评论家李东华从参评作品本身出发,认为本次评奖的特点是获奖作品题材、体裁丰富多样,作品奖集中在优秀短篇原创作品上。现如今儿童文学评奖对短篇作品关注较少,大都集中在优秀图书方面,影响较大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评选出的优秀短篇作品也数量有限。她建议主办方可充分发挥杂志、名刊、名人的优势在发现优秀短篇原创作品上多下功夫。毕竟,短篇恰



优秀作品奖获奖者与颁奖嘉宾合影



优秀小作家获奖者与颁奖嘉宾合影

恰是培养新人的最好途径,杂志也是发现新人的最好平台。只有逐步扩大奖项的影响力,才能吸引更多作家参与评奖活动。

评奖要注重作品的艺术性

据评委介绍,本届评奖的获奖作品无论小说、童话、散文还是诗歌、报告文学作品都体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艺术性是评委们特别看重的,评审细则特别指出要评选出“稳健又活泼、雅致又亲切、丰富又精粹的优秀之作”,这与《儿童文学》一直以来主打纯文学作品的风格也是一脉相承的。面对当下儿童文学创作中急于求成、追求畅销的浮躁之风,坚守作品的文学性、不降低对作品艺术水准的要求显得十分重要。

徐德霞认为,如今的孩子视野开阔,在阅读上也有很高要求,看了开头就能知道结尾的故事对低年级小朋友可能还有些吸引力,但对年龄较大的同学们来说就没什么意思了,他们需要的是优美、高雅、有品位的儿童文学作品。老臣的《开往秋天地铁》便是如此,男孩儿遇到一个小乞丐,动了恻隐之心递给他两块钱,可后来他发现这是一个职业乞丐,男孩儿纠结很久决定每天都给小乞丐钱,直到最终感动了小乞丐。小说写得很像诗,通过两个男孩儿的较量,把少年人的成长放入了复杂的社会大背景中。

本次评奖顾问、作家、评论家樊发稼认为,以较高的艺术标准为标杆发现新人新作是件好事,评奖结果也基本体现了这一发现。小学教育是教育的基础,要重视对孩子进行审美教育。他还提出,评委的构成将直接影响评奖的科学性、权威性 & 影响力,对文学作品的评价本身就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过程,从初评环节就要把好评关,尽量避免由杂志社编辑担任评委,这样才能有效杜绝感情分等其他不良因素的影响。

短评

黄庆云是中国儿童文学史上一个响当当的名字。91岁高龄的她,理想仍然,灵性依旧,勤奋照样,继续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证明儿童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刚读完她与女儿周蜜蜜合著的童话《会鸟语的妈妈》不久,我又读到了她的《苗山少年传奇》(湖北教育出版社),敬佩再度油然而生。

黄庆云的这部作品确是几十年的酝酿、构思所得。上世纪80年代,她担任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时,曾深入到海南岛苗族聚居的山区,与苗山少年一起住竹屋,救小鹿;一道翻山坡,进林场;一同建学校,听故事。她的创作就植根于对中华各民族人生命体验的丰厚积累,对长期居住于南部边疆山寨的苗族少年生存状态的深切理解,对历史发展中各民族人共同构筑中华文化的幽深洞察。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在创作中做到却很难。

由于自然条件等限制,少数民族地区似乎天然地与贫困、闭塞、苦难联系在一起。但作家的描述不局限于此。在全书精巧而精妙的布局中,作家不仅写到了苗族儿童盘娃、小龙的祖辈受日本鬼子杀戮,以致爷爷牺牲、姑姑丢失;盘爱苗的爸爸抗战前跟汉族木匠学手艺,日本鬼子侵占海南迫使他们师徒分离;罗铁牛的大爷爷被逼着套上铁犁头给地主耕田;以及黎族女孩阿海瑾的妈妈被头人指为“禁母”,穿过烈火逃生等往昔的悲惨故事,又自然而然地通过盘娃、小龙到吊罗山上、进原始森林、上新建小学、救海南坡鹿等一系列情节,写活了苗山上的苗族孩子:朴实的盘娃、调皮的小龙、胆大的罗铁牛、懂事的盘爱苗。作家把人们都能讲出来的时代变迁、民族平等、新一代少年儿童成长的故事讲得独特,讲得别致,讲得动人,讲得留在读者心坎儿上。在小说里,时代不只是背景,不只是投影和折射,而是真切切地地存在于苗山少年的生活中。这些苗山少年和他们的亲人、乡人,都是在新时代所带来的新希望中担着新责任,过着新日子。而作品里也收藏了作家生命中的一段宝贵时光。

近年间,随着民族地区的日益开放,汉族作家写少数民族儿童生活的作品多起来。黄庆云的不同在于,她因深爱各民族儿童而对他们生活的底子深有了悟,既以民族儿童的视角书写民族发展的现实,更注重从民族民间儿童文学中汲取悬疑、巧合等艺术手法。仔细阅读就会发现,几乎每一小节的末尾,作家都抛出一个读者急于要打开的疑团,几乎每一个人物的出现,都是与苗山少年的成长和命运关连着,几乎每一种动物的描述、每一种树木的阐释,都别开生面。这就使平平常常的现实抒写变得曲曲折折、弯弯绕绕,更使苗山少年上山上学、牧牛牧鹿的普通日子洒进了奇谲诡谲的色彩,使他们求知求索、爱家爱国的良好心意洒透了奇妙奇幻的情思;于是,作品就更具感人肺腑的生活质感、引人入胜的知识内涵和耐人咀嚼的民族情味。而且,作家还不失时机地插入一些有情有理、有趣有味的民族童谣和童诗,又使苗山少年身上所体现的民族性格的发展、民族精神的焕发凝聚成一种诗情,凝集成一种诗意,凝结成一种诗性。从而形成作品整体的一种民族情调、一种地域情韵,一种儿童情愫,并由此呈现出苗山少年的美好心灵,散发出特定时代的生活气息。

显然,作家的创作是对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呼应。其间,新的历史观与民族民间美学趣味的融合,无疑联系着深广的民族文化背景,也显示了新的主流价值的重建。同时,还应看到,作家也深受中国古典小说叙事模式的影响,崇尚传奇性。比如,整部小说中,大故事套着小故事,山上故事串着山下故事,苗族故事牵着黎族故事,小孩故事连着老人故事。就像观众在剧院看一台大戏,一幕幕、一场场,中间有情景的迁动、道具的置换。但,变而不杂,繁而不乱,多而不厌,小说情节就在这样的戏剧张力中急速发展,直到结尾时盘娃、小龙认了姑姑,阖家团聚。在经过一个大循环之后,叙事归于圆满。在小说叙事上,少有静态的描摹,多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在事件的进行、发展中展示人物的多侧面。可以看到,小说在小孩、老人各自的经历遭遇之间,不断交错地推进叙事,并且不时地加入对山水自然情状的描绘和对热带森林气息的渲染,还巧妙地将民族的神话传说隐藏在当下的叙事中,透露出简单背后的无限丰富,透出出简炼蕴含的万般绚丽。这就使小说情节曲折而清晰明了,弯绕而直指人心。小说在书写老人追忆与小孩当下的时空变换中,时时穿插倒叙,从而使叙事更富于节奏变化,使小说的情节和人物更为出彩,更加出奇;既不断将叙事推向高潮,又留下了诸多可堪玩味、可供想象的空间。

动人的传奇 沁心的诗意

——读黄庆云《苗山少年传奇》

□张锦贻